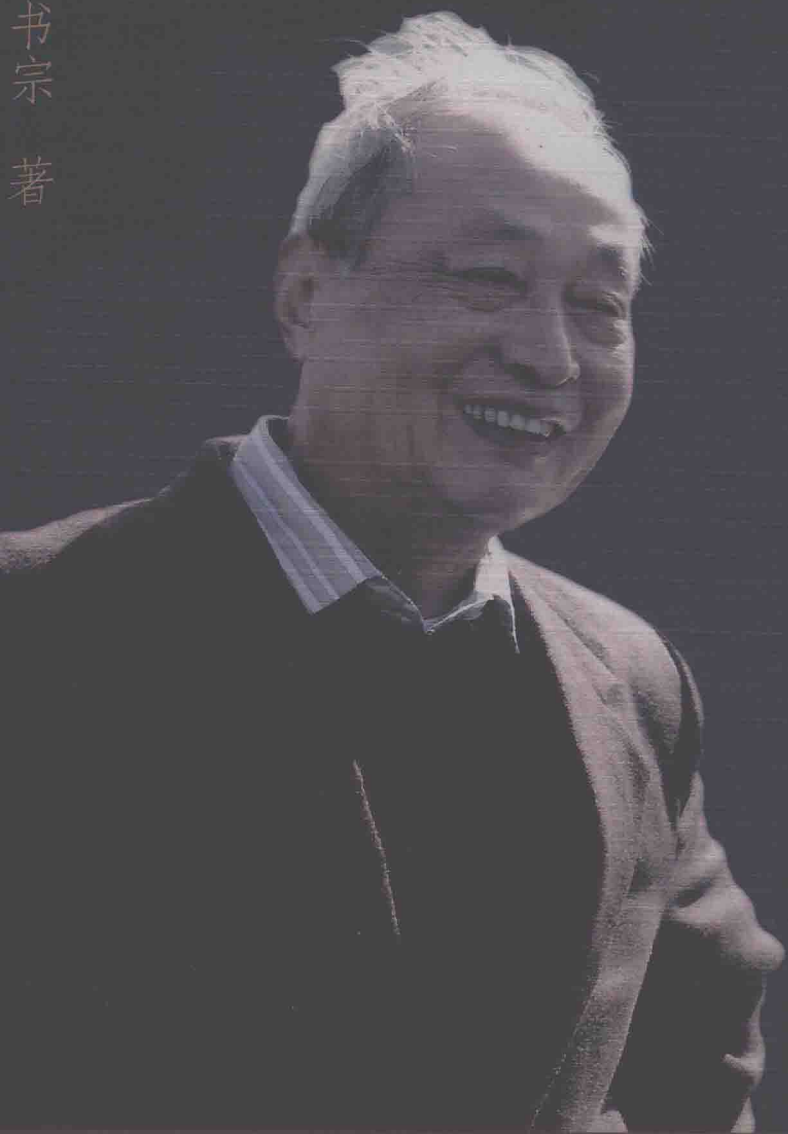


人·时代·社会

——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

叶书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人·时代·社会

——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

叶书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叶书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ISBN 978-7-5426-6325-2

I. ①人… II. ①叶… III. ①叶书宗—自传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6535 号

人·时代·社会 ——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

著 者 叶书宗

责任编辑 钱震华

装帧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3
书 号 ISBN 978-7-5426-6325-2/K·468
定 价 88.00元

卷首语：人生是一串故事

—

我，叶书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岁次丙子，四月初三（公历 1936 年 5 月 23 日，丙子年闰 3 月），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城内五关里，属鼠。

我对自己的生肖属相十分地不喜欢。虽说属相仅用于记人的出生年，并无别的什么玄机，鼠又是十二属相之首，但是鼠几乎是为全人类所憎恶的动物。在汉字中，凡是带鼠字的成语，几乎都是贬义的：“獐头鼠目”，形容人的形象猥琐；“抱头鼠窜”，形容逃跑之狼狈；“胆小如鼠”，形容人极其谨小慎微，甚至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破脑袋；“鼠目寸光”则形容人的见识浅薄，眼界狭窄至极；对心胸狭窄，连芝麻大的事也耿耿于怀的人，则称为“鼠肚鸡肠”。此外，如“鼠窃狗盗”、“鼠牙雀角”等等，也全是贬义词。对那些极端鄙视、蔑视的鸡鸣狗盗之徒，则斥之为“鼠辈”。至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则是形容那些人人痛恨，千夫所指的坏人的狼狈处境。由此看来中国人尤其讨厌鼠。那么，是否古人对鼠曾经有过好感呢？想想也不是。编成于春秋时期的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吟唱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可见 2500 来年前，古人已经把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奴隶主阶级，比做大老鼠；诅咒即使“惹不起”，希望能“躲得起”。

在现实生活中，鼠是被人类极端讨厌、无比痛恨的坏动物，与之斗争恐怕不会短于 2500 来年。可是，鼠这种动物，脑袋虽小，却无比机灵、狡猾，加上繁殖能力出奇地强。纵然人类想尽

各种办法来消灭它,可是有的地方甚至眼看它泛滥成灾,也只能徒叹奈何。1950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鼠被列为“四害”之首。应该说,运动很有成效,可是鼠害之猖獗依旧。依稀记得20世纪90年代,报上曾刊登过一则讯息:鼠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极佳肉食品,且口感极其鲜美。某地(好像是山西)的某人士开发、开办了鼠肉罐头食品厂,产、销两旺,生意兴隆。刊登这则讯息的意思很清楚:希望大家争购鼠肉罐头。不要说品尝,我一想到鼠肉就恶心。不过我想,真能如报上所说,何愁鼠患不消。不要说人人争购鼠肉罐头,中国的人口基数那么大,即使只有1/100的人购买鼠肉罐头,亦足可让生产鼠肉罐头的企业日进斗金,更何患鼠害不灭?可惜,后来就无声无息了。又后来,报上刊登过有些灭鼠能手,一天能抓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老鼠。可是我想,灭鼠能手能有几个;以中国之大,区区几个灭鼠能手,对于鼠患来说,恐怕连杯水车薪都说不上。而且,又叫谁给灭鼠能手每月按时发薪水和奖金呢?如果一无薪水,二无奖金,光叫灭鼠能手“学雷锋”,恐怕也难以持久。果然,有关这则报道,再也无声无息了。

世界之大,真乃无奇不有。近年来,法国巴黎饱受鼠患困扰。在以小资闻名的玛莱区,有居民抱怨:“一个晚上就看到了200只老鼠。”有鉴于鼠灾之威胁,巴黎市政府终于痛下灭鼠之决心,准备在包括战神广场在内的9个公园草地上,以及市内4区和15区的广场上,投放老鼠药和捕鼠器。可是,大规模灭鼠的行动尚未开始,却引来了动物保护主义人士的反对,认为“直接捕杀老鼠过于残忍。而老鼠只是外表丑陋,对人类没有危害。”这群人士还在网上发起保护老鼠的请愿行动,居然还征集到2万多个签名。但是,饱受鼠害的巴黎居民则在网上留言:“若是政府停止灭鼠,那索性把老鼠都放进这些动物保护主义人士的家里去。”^①

^① 见《灭鼠派保鼠派互掐 巴黎政府左右为难》,载《新民晚报》2016年12月22日,A19。

但是,这也是舌战而已,也是并无下文。

唉!看来消灭老鼠是遥遥无期的了。

当然,鼠是啮齿目部分动物的通称,落实到具体的鼠,则有十几种之多。其中的小白鼠还能作为医学上的试验、解剖之用,松鼠还有几分可观赏的成分。但是一般所说的鼠,就是指那种繁殖力极强、破坏性特烈、传染疾病最可怕、形象丑恶至极的褐家鼠。虽然中国的生肖并没有明确是哪一种鼠,总不见得说自己是属“松鼠”吧!

我对中国上古历史始终没有什么深入研究,因此搞不懂古人何以把鼠列为十二生肖之首。对于这个问题,只好存疑。

当然,这些也是闲话,是我个人的人生回忆录《人·时代·社会》的闲话。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我出生在浙江省因天台山而得天台县。天台山是四明山的支脉。山有八重,层层叠叠。连绵起伏的山峰,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因群峰顶对三台星宿,故名“天台”。天台县特有的山水灵秀,佛宗道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仰慕的圣地。唐人李白(701—762)诗云: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大自然的造化,育成天台山水,钟灵毓秀。但是直到20世纪前半段的中华民国年间,天台县还是穷乡僻壤。天台县已是浙东够偏僻的山城了,五关里又是天台县城靠近荒凉破败的大北门的冷僻小巷,可谓是冷僻中的冷僻。听祖母说,叶氏从我曾祖开始就住在五关里了。到我父亲这一辈,共有七房兄弟、堂兄弟,都住在五关里。因此,五关里是天台县叶氏较为集中的居住地之一。

五关里虽然是一条冷僻、穷困、破败的小巷,在天台县却也小有名声。

小巷的深处是一座建于清初的古老大四合院,我的一位堂伯父就住在这座院子里。这座大四合院坐北朝南,颇有气势。正厅为高大的单檐、硬山顶建筑。正厅上方悬挂着一块

“世美堂”的黑底金字匾额，衬托出整座四合院的威严。匾额两边的梁上，还挂着两只红底镏金的木箱。听老人说，那两只木箱里各放着一只金钢圈（神话小说《封神榜》里，哪吒使用的兵器之一），能镇妖辟邪。本世纪初，我每次返乡，都要到那里去看看。“世美堂”的匾额，以及梁上的两只木箱，均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砸毁。整座建筑比我记忆中的更为破败了，就像一个日益枯干、佝偻的老人，无奈地艰难挣扎着。四合院的大门上虽然钉着天台县人民政府立的“保护性建筑”牌子，可是院子里居住着多户人家，叫谁保护？又有谁有能力保护？谁又肯保护？

和这座古老的大四合院相连通的，还有一座坐西朝东的大院落，我的另一位堂伯父，1951年之前就住在这座大院落里。这座建筑十分考究、华丽的大院，落成于晚清，是一位举人的府邸。正门坐北朝南，虽然不大，上方悬有“魁元”两字的匾额，并立有两只花岗岩旗杆桩。整座院落为两进，中间凿一鱼池，上架小巧的石拱桥，连接前、后进。前进朝东的正厅铺满经过打磨的方砖，厅后设一考究的屏风。更为可贵的是，正厅堂前装有八扇雕花门，与走廊分隔。每扇门的上半部为不同的“一根藤”窗饰，中部浮雕分别为“石梁飞瀑”等著名的天台八景。听祖母说，制作每一扇雕花门，需耗一百个“工”^①。如今，这座院落的大门上虽然也钉着天台县人民政府立的“保护性建筑”牌子，但是院落已破败不堪，匾额和旗杆桩早已不见，连厅门也散落不全了。2014年4月，我在参加天台中学1954届同学毕业60周年聚会之后，到淡出市井的“天台山一根藤艺术馆”参观，意外发现这座民间艺术馆，竟收藏了一扇五关里举人大院正厅的一扇门。可见五关里虽然冷僻、穷困，却也曾经藏龙卧虎，曾经有过辉煌的昔日。

五关里的另一特点是大院连着小院，小院又通大院，连成

① “工”是天台民间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模糊的计工、计酬单位，基本上指一名雇工，从日出到日落，劳作一天——作者。

一大片，四面八方都能出入。这一大片密集、破败的建筑群，已远远超越了五关里的范围。这片古老、残破的民居群，室内阴暗、潮湿，卫生设施根本谈不上，而且很难改造、改建。因此，如今新潮的年轻人几乎都逃离了，剩下一些老人，以及无力易地建房的人们。艰难地“留守”在五关里的，大都等着拆迁。可是，五关里在天台城里的地理位置不佳，缺乏拆迁、开发的经济效益，也就拖着。也因此，现在重回到五关里看看，与我记忆中的五关里相比，更显萧索。

就全中国来看，东南沿海算是烟雨楼台的繁华之地。然而，我出生的地方却是老树昏鸦的凄凉角落。我出生的第二年，日本就发动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我来到人世，睁开眼睛，面对的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烽烟血海。祖国母亲以最艰难的步伐，拖着我走过童年。

1949年，我13岁，也读完了小学，考入天台县立中学（现天台中学）初中。在我从不懂世事的儿童，迈进初谙人世的少年的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跃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1976年5月23日，我在上海市桂林路70弄，第4宿舍的简陋的斗室里，自我解嘲，庆祝自己步入不惑之年。4个月之后，“四人帮”就倒台了。我虽然没有进过“牛棚”，但是对“文革”实在是极其厌恶。“文革”期间，物质生活的贫困自不待言，更其难受的还是心灵的煎熬。而且不论内心多么厌恶“文革”，可是在各种公开场合，还要违背良心，说“文革”是中国修筑的“反修、防修万里长城”；“文革”对于永保革命红旗不倒是多么必要、多么好，等等。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真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中国共产党终于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终于熬出了“文革”。接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样，我的前半生，可以习惯地概括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而1976年我40岁以后的后半生，则看到中国终于打开自我封闭的国门，把脚迈出已延续了几千年的小生产

状态的门槛,跨向人类社会进步的整体行列。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能亲历、亲证中国社会在20世纪怎样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脚踏进社会主义社会;又怎样终于冲破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封闭的樊篱,阔步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我个人来说,少年、青年时期一直在读书:读完小学、中学、大学;大学毕业后,又从研究班毕业。成年以后,就一直在高等学校里,当一名教师,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助教到教授,直到退休。看来,我大概可算是较为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的一粒沙子。

21世纪,当我成了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的时候,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既感慨生活的坎坷,又庆幸生逢其时,唏嘘、自豪,兼而有之。因此,我把自己一生走过的脚印拼接起来,并想以史学工作者的职业眼光和思维,透过拼接起来的这串脚印,透过知识分子的思路历程,从另一个侧面,见识、见证中国的变化。

作为一个个具体的“脚印”,也即我的生活经历来说,就像是一个个故事。拼接自己踏出来的那一个个“脚印”,就是讲述自己人生从童稚到白头所经历的那一串故事。我以为只有把这些“脚印”具体为故事,才能使得辨认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时,变得鲜活而有灵气,并有可能使旁人读起来产生如亲历其境般的真实感。北宋文豪苏轼(1037—1101)说“人生如梦”。也有人这样说:人生是一首长诗;人生是一首歌,……但是,我回首人生,世事沧桑,虽然感触良多,由于生性木讷,体味不出自己的人生有多少诗意,也激发不起足以引吭高歌的豪情。我只能絮叨自己的人生故事。人是时代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因此我把串起来的故事,起名为《人·时代·社会》。

二

20世纪既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送来神话般的生活条

件,但是又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甚至弄得不好,有的可能还是灾难。至于中国在20世纪里的变化,那就更大了!

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阶段性标志,莫过于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等三次革命。我之所以把“文革”也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列为是20世纪中国社会巨变的三大阶段性标志性之一,是因为觉得不管怎样评价“文革”,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经历了“文革”这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洗礼,才昂首阔步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行列的;不管怎样,“文革”都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小生产状态和自我封闭的句号,这是历史事实。中国只有在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这三次革命之后,自己动手拆毁作茧自缚的闭关自守樊篱,告别几千年的小生产状态,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跨越现代化的门槛,融入人类社会前进的整体行列。

回顾中国历史,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封建专制社会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明朝以前,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直到15世纪20年代,即郑和(1371—1434)在明朝永乐年间七次下西洋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世界公认的先进国家。15世纪末、17世纪初,即明朝的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欧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差不多是同步的。可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欧和北美的一些先进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成了产业革命,发展成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相比之下,中国则从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历史记录着,从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开始,中国愈来愈深地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但是,深层地看,中国的落后,中国被世界文明发展拉开距离,实际上是明朝。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1328—1398)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明皇朝建立。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

(1606—1645?)的大顺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皇朝灭亡。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由汉族建立和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16位皇帝、276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发生了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造成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但是明皇朝是惟一由地道的贫苦农民当皇帝所建立的王朝。

翻翻历史书,看到恰恰是这个由地道的贫苦农民当皇帝所建立的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王朝中最为不堪,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破坏、阻碍作用最大的王朝。

在明王朝统治中国的这近三个世纪里,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在意识形态层面,西欧社会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颠覆了统治中世纪的陈腐观念,把公民人格平等、人的世俗利益,提升为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中心,为建立当代法治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同一时期,再看明王朝统治的中国,为了永固朱家的一统天下,由皇帝直接出面,把理学钦定为全国惟一的正统思想,禁锢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别不容许一丝人本主义意识破土。

其次,14世纪前后,资本主义萌芽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以后,迅速健康成长,很快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反观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虽然与西欧社会同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由于明皇朝的百般窒息,已经破土的资本主义幼芽不能正常地生长,始终气息奄奄,半死不活。所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覆盖西欧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仍然是处于封建皇权统治下的残破的自然经济状态。

再次,发轫于西欧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让人类社会触摸到了球形的世界,触发了西方人的海外殖民狂潮。终于,海洋成就了西方人创造近代文明的新辉煌。反观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郑和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奉皇帝之命,耗费1/3的国库,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可是,郑和下西洋对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和

近代文明,究竟有多少贡献呢?说白了,无非是留下一串历史陈迹,供后人发思古之幽情。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三个转折性世纪里,中国虽然曾经拥有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中国社会也曾经和西方社会同步,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曾透出一丝微弱的人本主义呼喊。但是,所有这些先进的、孕育着的东西全因明皇朝的窒息而无奈地枯萎。因此,可以说,在明王朝近三个世纪统治的时段里,中国社会发展如同一下子患上了“侏儒病”。就是这个由地道的农民当皇帝所建立的王朝,铸就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人类社会中的落后,国家的屈辱,以及人民的不幸。

19世纪中后期,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反思中国的命运,并为改变中国的面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850年,洪秀全(1814—1864)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改造中国的伟大运动中的首举。但是,洪秀全所走的完全是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老套路:用宗教的外衣包裹政治的实质;高举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旗帜,吸引农民;封王称帝,建立新朝。太平天国起义,和变革生产关系,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多大关系。旧式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道路;也即更换最高权力掌管者皇帝,多少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明王朝的覆没就已经为之画上句号。因此,洪秀全的结局,甚至比李自成还不如。李自成好歹建立了大顺政权,还攻进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而洪秀全在起义之初,还没来得及成气候,就忙不迭地在永安封王,等到攻下南京城,已是踌躇满志,一心营建小朝廷了。洪秀全只龟缩在南京,过了十几年可怜、可叹、可悲的帝王生活。

孙中山(1866—1925)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新历史的开拓者。

孙中山摒弃了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革命旧模式,接受近代西方民主革命思想;扔掉披了两千多年的那件宗教破外衣,拟定革命政治纲领;组建革命政党,发动

城市武装起义。孙中山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帝制统治,但是中国社会却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农民国家。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对中国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孙中山在海外建立革命政党,和中国农民隔着远远一段距离。孙中山历次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几乎都得不到农民的响应。孙中山的悲剧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农民;辛亥革命的悲剧是因为脱离了农民。在农民国家领导革命、改造社会,却脱离了农民,怎么能有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以农民为依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中国农民起义历来所走的“啸聚山林,占山为王”的道路。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最大限度地鼓动农民奋起造反,把农民卷入革命队伍;又不致使革命模糊共产主义的理想方向,跌入平均主义的泥坑。在这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地看到,并且充分发挥早期知识分子中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分子的作用,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既要看到,没有遍地烽火,就不可能有燎原之焰;但是更要注意,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所带来的山头主义、流寇主义、分散主义,是革命胜利的心腹大患。农民革命自身是不可能、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依靠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作为铁的纪律,并以铁的手段予以贯彻,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无论大大小小的“家”(根据地,也即“山头”),既要枪杆子起家、以枪杆子护家;但是绝对不能发生军阀主义,

出现拥兵自重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党的组织原则,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之始,就提出并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的解决,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如果说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的话;那么,毛泽东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辟了中国社会通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由于中国的历史包袱过于沉重,农民需要好皇帝的中国社会基因只能逐步淡出历史,实现国家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自然也特别重大。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毛泽东自己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三次革命。期间,还进行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灭亡中国的全民神圣抗日战争为代表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单单鲜血和生命就是三千八百万;财产损失实在难以计数。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走向国家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没有如中国那样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腥风血雨,才卸下不堪重负的历史包袱,向现代社会迈进,这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根本特点。我生于 1936 年,也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我的一生可以这样概括:“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我所概括的是我生活的时代大背景,我的一串“故事”就是这幅大背景上的斑斑点点。是时代赋予我的生活以特殊内容;改革开放则为我提供将生活的特殊内容,涂抹成斑斑点点,连成一串“故事”的可能。我再次说:何幸生逢其时!

三

20 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炼狱。20 世纪对于中国知识

分子来说,如果不说它是中国社会巨变的重心的话,那么它至少也处于巨变的中心位置,是中国社会巨变的重心内容之一。

历史发展铸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然而,知识分子的状况、价值取向,又是受特定社会培养知识分子的制度,以及该社会对知识分子要求,包括提供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所制约的。当然,知识分子的状况、价值取向,又反过来制约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和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就是这么纠结。

中国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到两汉的漫长时期里,思想是比较自由的,社会提供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较为宽广。在古代中国的那个环境里,知识分子也有较为个性化的自我价值取向。介子推(春秋时期晋国贵族,生卒年不详)自焚绵山,严光(字子陵,曾与刘秀同学,生卒年不详)在刘秀(前6—后57)即位后,拒不应召,隐居富春山垂钓,都是知识分子拒绝高官厚禄,坚持自己的既定价值取向的典型。但是,自隋、唐以降,封建朝廷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培养,就形成了围绕科举考试转的陀螺式应试教育制度。由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几乎完全被圈进了官本位的囚笼。

科举取士制度的核心和危害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围着皇帝转。这样一来,中国知识分子也从社会发展的基石,蜕变成封建朝廷巩固王朝统治的基石。在世界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中国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科举制的实行,对于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寒士来说,的确也为他们辟出了一条通向飞黄腾达的道路。但是,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来说,如同缠足是中国女人的悲哀一样,皓首穷经追求金榜题名,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正是从隋、唐盛世,也即从中国封建统治的鼎盛时期开始的。

在考试、选拔人才制度上,隋朝停止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隋因朝祚短暂,来不及使科举制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到了唐朝,科举制就臻于完备了。科举制虽然也和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一样,是封建朝

廷选拔人才、任用官员的一种制度。但是,它和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根本的区别在于它能够把所有知识分子都圈入科举考试的范围之内。这个“旋转陀螺”的魅力在于:科举制打破了地方官员和世族豪门垄断选举权的局面,形成上不分门第高下,人不问世族寒门,均可报名投考,都有进入仕途的机会。由于实行科举制,使得读书、应考、做官,三者合而为一。考试和选拔人才制度的这一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读书的积极性。考试制度的变革,也带动了教学体制的变革。除了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国家的最高学府外,各地州府的书院、书馆、学舍,也纷纷成立,招收学子开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社会的读书风尚。

实行科举制,科举考试的形式、科目(考试的内容、范围)、录取标准,就成为全社会读书、研究的指挥棒。科举考试就形式而言,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杂文等多种形式。就科目而言,常规科目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等。除常规科之外,还有制科、武科。但是,考试的基本范围是四书、五经等九部经书;考试的基本要求是死记硬背。科举制在以后虽有改革,但是基本形式、内容,直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除科举制,在 1300 年来里,并无变化。因此,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落伍,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忽视科举制在其中所起的拖后、阻碍作用。

众所周知,15、16 世纪,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在西欧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波兰学者哥白尼(1473—1543)根据自己 30 多年对日、月、行星运动的观察和推算,并总结此前的天文学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哥白尼大约在 1536 年,完成了被恩格斯称为“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天体运行论》。^①继哥白尼之后,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于 1609 年制造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63 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年。

出第一架用以观察天空的天文望远镜。借助这架天文望远镜,伽利略发现了大量新的星体。伽利略还看到:月球表面有着和地球同样的山脉和峡谷;而肉眼看上去白茫茫的天河,原来是由众多星体组成的。伽利略的这些发现,进一步打开了宇宙的奥秘。1610年,他的惊世著作《星空使者》出版。世人高呼:“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①伽利略还研究了物体下落问题。他在比萨斜塔上同时下抛不同的物体,证明它们下落的速度相同,从而推翻了中世纪经院学派顽固地坚守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陈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于1609年出版《新天文学》,阐述和论证了宇宙行星运行的规律,进一步完备了天体宇宙学说。在这期间,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也都有惊人的突破。

中世纪晚期,西欧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发展、大突破,某种程度上是西欧教育事业发展和提高的体现。英国在1209年就创办了剑桥大学。同是在13世纪初,又创建了牛津大学(一说建于12世纪后期)。这两所著名大学,不仅培养了无数科学家、思想家,更带动了西方各国各类学校的建设和教育理念的变革。

反观中国的科举制度在经历了辉煌时期以后,到15、16世纪已经越来越走向腐朽、没落,成为封建王朝禁锢人的思想,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性制度。

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实际上分为学校考试制度和官吏选任考试制度等两个层次。不论哪个层次的考试,统由官方安排。学校考试制度是官办学校按规定对生员从入学到结业所举行的各级考试,可以看作是官吏选任考试的必需的前期准备。因为任何读书人必须先通过学校考试,取得生员(通称

^① 转引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46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